

張子正蒙注



王夫之著

張子正蒙注

中華書局

张子正蒙注

王夫之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¹/₄印张 206千字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686 定价：1.05元

前言

《张子正蒙注》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他通过为北宋张载的《正蒙》一书作注解的形式，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对佛老唯心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宋明道学进行了分析批判，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

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言）张载作《正蒙》和王夫之注《正蒙》，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哲学领域中的反映。

宋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起义军，直接冲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统治阶级内

部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相当激烈，中小地主反对大地主和寺院主的封建特权，要求改革政治。反映在哲学领域就有唯物主义反对佛教和道教所宣扬的唯心主义的斗争。

张载（公元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年）字子厚，陕西郿县人。他是这个时期在哲学上反对佛老唯心主义的代表，他的《正蒙》就是和佛老唯心主义斗争的产物。王夫之十分推崇张载，并对他的思想作了精湛的分析，认为他在北宋「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哲学斗争中，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

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北宋王朝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一方面继续利用佛教和道教的迷信思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以此保护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另一方面则急于寻求一种更加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新的反动思想武器，于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兼收佛老唯心主义思想的道学唯心主义就应运而生。

北宋道学形成初期，以程颢、程颐为代表，他们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攻击王安石的「新学」坏了后生学者，是当时的「大患」。在哲学上反对张载在和佛老唯心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气一元论」思想。他们提出「天即理」，把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统治秩序奉为「天理」，这是直接对「均贫富，等贵贱」的农民革命思想的反扑。南宋朱熹更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更反动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为气本」，「理在物先」，把「理」

作为宇宙的根本和一切事物的根源。他们反对农民起义，反对要求改革和前进的政治路线，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歪曲为「天理」和「人欲」的矛盾，把孔丘的「克己复礼」直接变为「存天理、灭人欲」，妄想禁锢一切违背封建统治秩序思想和行为，从而把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作用，以封建道德修养的形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从思想上压制人民的反抗。程朱的理学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适应了地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需要。因而从南宋到明清几百年间，理学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

明代中期以后，封建政权愈来愈腐朽，农民起义的烽火连年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皇室与藩王、宦官与官僚地主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这时候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虽然是科举考试必须背诵的繁琐的教条，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猎取官职的工具，但它的思想统治作用在农民起义冲击下，却逐渐减弱。于是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道学中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心学开始盛行，王守仁就是这个反动哲学流派的主要人物。他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宣扬封建道德是人人心中固有的先验意识，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新的反动说教，妄想以此钳制人民的思想，挽救明王朝的覆亡。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

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无论理学或心学都没有能挽救统治集团的政治危机。明代农民起义不但次数多，规模大，而且继承历代农民起义的传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税」的政治纲领，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横征暴敛的黑暗政治针锋相对，更明确地表现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思想，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也直接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道学唯心主义提出了挑战，推动了哲学领域中唯心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

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经历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曾参加过抗清活动。清初，一度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晚年隐居衡阳西乡石船山，通过著书，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上，他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派，反对明代土地兼并，反对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幻想由上而下地实行改革，限制土地兼并，减轻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赋税。这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有一定进步意义。

王夫之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哲学理论方面。他认为道学唯心主义流行，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改革政治，首先要批判道学唯心主义。因此，他注《正蒙》不仅是为了阐发「张横渠之正学」（自题《墓铭》），继承张载的批判精神，继续批

判佛老唯心主义，而且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当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而复又流行的道学唯心主义，以便「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王敦：《姜斋公行述》）。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王夫之对道学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

二

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张载在《正蒙》中明确指出「气」是世界的实体，认为「虚空即气」，有形有象可见的万物以及看来空虚无物的「太虚」都是气所构成的，聚而有形，散而无形，只不过是气的「变化之客形」，所以气的存在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无所谓「有无」和「生灭」。驳斥了道家「虚能生气」和「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观点。王夫之继承了张载「虚空即气」说。在《注》中进一步说明气是客观存在的，是世界的物质实体，不能因为人们看得见或看不见来判断它的有无。他说一车柴火燃烧之后，化为焰、烟、烬，属木的归木，属水的归水，属土的归土，不过变成很细小的东西而看不见罢了；做饭的蒸气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盖严了它就散不出去。于是他得出结论，物质的气只有

往来、屈伸、聚散、隐显的分别而不生不灭。这种思想接近于物质不灭的观点，对哲学唯物主义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张载在《正蒙》中夸大了气的「太虚」形态的神妙作用，称之为「清通不可象」，而把具体的、也是气的形态的万物，称为「神化之糟粕」。王夫之针对这一点，在《注》中强调了「不可象者即在象中」，指出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纠正了张载在具体的特殊的气之上另有一个一般的气的错误观点，不仅肯定气是客观世界的物质基础，而且反复论证，赋予气以物质存在的意义。他还指出「气则动者也」，气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在这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理气关系，认为理是气的运动变化的规律，表现气的「屈伸相因之条理」，是依凭于气的，决不能「去气外求理」。理既是气的运动变化规律，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就是说他认为理是物质运动所固有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能够遵循的。离开物质世界而讲道德，则是「孤守一己之微明」的「异端」。明确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把道学唯心主义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颠倒了过来，也粉碎了道学唯心主义把封建统治秩序和道德观念作为世界根源和万物基础的神话。

王夫之充分肯定了张载关于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这一观点，在《序论》中指出：「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因为张载对阴阳二气的聚散升降、不断变化作了详细的描述，说明天

地的一切变化，包括人的生和死，都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而「莫或使之」。这对于当时流行的阴间鬼神支配人间世界，以及生死轮回和长生不死等佛教和道教的谬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王夫之在《注》中则进一步明确「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说明运动是物质自身的矛盾运动。黑格尔曾经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自然辩证法》）王夫之的认识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他明确指出不能象「老氏以天地为橐籥」，这就是说，老子认为天地象一个风箱，就有个谁来鼓动的问题，他排除了这种外因论，指出「阴阳具于太虚絪縕之中」，物质性的太虚包涵着内在的阴阳矛盾运动。此外他还指出物质矛盾运动具有规律性，所谓「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一动一静都有规律。用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对道学唯心主义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形而上学观点，予以有力的抨击。

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哲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张载既肯定自然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的认识要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由人的感官接受外来的印象，而使「内外之合也」。承认客观世界和事物的本质是可以被认识的，只要「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驳

斥了佛教不去认识客观世界反而把山河大地看成假象的谬论。王夫之则在《注》中进一步分析了知觉发生的条件，认为感觉器官，思维作用，客观对象，「三相遇而知觉乃发」。他认为客观存在的物体是知觉的客观条件，耳目感官和大脑的思维作用是知觉的主观条件，耳目好比大脑的窗戶，相互作用才能听到声音，看到颜色，缺一不可。他既反对经验论「以见闻域所知」，也反对不可知论「据见闻之所穷而遂谓无」。重视发挥大脑的思维作用，但仍要以客观世界为基础，所以他主张「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启发心思而会归于一」。这是一条从客观存在到感觉思维的唯物主义路线，有力地批判了道学唯心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心中固有」）或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所赋予」）唯心论的先验论。同时，王夫之还认为，人不仅从客观世界获得知识，还要「实践之」，如果所得的知识不能用，「犹之乎弗知」。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感到应该观察事物的变化，积累经验，才能预见事变的发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到掌握自然规律而「不惊」、「不逆」，使自然界「唯其所裁」。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有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自觉能动性。当然，「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自然辩证法》）王夫之所谓的实践，还只是个人的生活体验，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了解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还有原则区别。但在当时针对王守仁所宣扬的唯心主

义的「知行合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张载在《正蒙》中还提出了一种泛爱思想，即所谓「民胞物与」，这是说一切人都是同胞兄弟，一切物都是天地间的同伴，因而要爱一切人，一切物。毛主席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张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并不主张取消封建等级制度，也不可能提出平等的主张，而是鼓吹以封建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恩爱」。这由于他虽然看到了客观存在的矛盾斗争，却没有离开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幻想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最终可以调和（「仇必和而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也将得以巩固。所以，很清楚，他所宣扬的「爱」，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欺骗，无非让劳动人民去爱剥削他们的地主阶级，要劳动人民放弃革命的念头。这也是地主阶级立场决定的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在这方面，王夫之和张载的观点是一致的。王夫之的人性论和道德观虽然有某些进步因素，如强调「性与习成」，反对道学唯心主义宣扬的「天命之性」；企图说明理和欲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理必在欲上见」，没有欲，也就没有理，以此反对道学唯心主义「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观点。但是由于他最终仍把道德观念看成人性

的内容，把孝慈等道德意识看成天生具有的，所以同样强调君臣父子之理，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社会伦理学方面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

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王夫之的成就在于他在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在与道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对前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了理论的概括，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能够更有力地打击唯心主义。至于他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反对农民革命，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大防」，看到封建制度百孔千疮却又幻想改良它，继续维持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对道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传统束缚。这些都反映了王夫之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 *

《张子正蒙注》曾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由古籍出版社据太平洋书局本排印。现在改用一八六五年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为底本，重新校勘标点。《正蒙》原文与明万历年间陕西凤翔府官刻本的清初翻刻本相对勘，《注》文则参照周调阳依衡阳刘氏家藏抄本及衡阳学署本所作的校勘记，作了改、补、删。金陵刻本错漏的地方或衍文，仍旧保留，用

(一) 小号字表示，改、补的字句，均用「」表示，一律不再出校记。明显的错字则径予改正。凡与其他古籍相对勘或按上下文意义有所乙正者，在本页末出校记，说明改动原因。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九月

序论

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以是养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

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

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囊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躐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明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

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沓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叢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觐圣功也。嗚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敦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未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熿，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